

发现东亚

宋念申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发现东亚 / 宋念申著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
2018.7

ISBN 978-7-5133-3039-8

I. ①发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东亚—历史 IV.
①K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3636号

发现东亚

宋念申 著

责任编辑 汪欣
特邀编辑 钟元楷
装帧设计 周伟伟
责任印制 史广宜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出 版 人 马汝军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电 话 (010)88310888 传 真 (010)65270449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68423599 邮 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920mm×1270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180千字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3039-8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录

前言 / 1

一 亚洲反题 / 7

1. 何为“东亚”？为何“东亚”？ / 9
2. 中国不是 China，日本不是 Japan / 14
3. 浪漫化亚洲·最后的武士 / 18

二 朝鲜之战 开启东亚现代的“世界大战” / 25

1. 下克上：丰臣的抱负 / 27
2. 礼制天下：明朝与朝鲜的内忧外患 / 31
3. 东亚“国际关系”的记忆节点 / 35
4. 战和之间：历史记忆与宗藩政治文化 / 39

三 满洲崛起 多元国家的塑成 / 45

1. 边缘异动：满洲作为多边边疆 / 47
2. 建构大清：皇太极的多元帝国 / 51
3. “满”与“旗”：族、籍之间 / 55
4. “夷”在东亚：异族与正统 / 60

四 新天下秩序 新的“中华”、新的天下 / 65

1. 礼部“外交”：“朝贡”作为权力和文化 / 67
2. 内亚帝国：满蒙藏政治 / 信仰共同体 / 72
3. 清俄碰撞：欧亚相遇中重塑“中国” / 77
4. “中华”失焦的“天下” / 82

五 耶稣会士 欧亚的现代相遇 / 89

1. 画师·臣子·教士：郎世宁的使命 / 91
2. 逃犯与圣徒：东亚遇上天主教 / 96
3. 耶稣会的成功学 / 102
4. 利玛窦规矩 / 106
5. 逆转之夜：日本天主教的毁灭 / 112
6. 隐匿的基督徒 / 116
7. 门外人议屋内事：中西交流之殇 / 121
8. 北堂的不速之客：天主教在晚期朝鲜 / 127
9. “锁国”神话的背后 / 131

六 早期全球化 东亚的重要角色 / 137

1. 白的银，黑的人 / 139
2. 茶在西方，烟在东方 / 145
3. 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 / 150
4. 喧嚣的口岸 / 155
5. 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 / 161

七 其命维新 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 / 169

1. 思想契机：姜沆与朱舜水 / 171
2. 江南风格与江户浮世 / 176
3. 重建道统：清学的逻辑 / 182
4. 再造日本：江户思想之激荡 / 186
5. 经世：实学在东亚 / 192

八 文明与野蛮 殖民“现代性”入侵 / 199

1. 林则徐在纽约：毒品·战争·“现代” / 201
2. 黑船上的陌生人：日美相遇 / 207

3. 从“天下”到“区域”：东亚秩序的重组 / 213
4. “体”“用”之间：“文明开化”下的东方 / 219

九 民族国家、亚洲主义与国际 / 225

1. 种族进化：殖民与抵抗的逻辑 / 227
2. 合法与非法的亚洲 / 234
3. 黑龙会的朋友们：1912年的“亚洲”想象 / 239
4. 脱亚自救：转折 1919 / 246
5. 建设与失序：步入“现代时间”的东亚 / 251

十 从二战到冷战 / 259

1. 用什么“超克近代”？ / 261
2. 从长崎到密苏里号：日本的战败 / 266
3. 内战，冷战，热战 / 273
4. 作为第三世界的“亚洲” / 279
5. 从“东亚奇迹”到“亚洲价值” / 285
6. 如何记忆东亚现代 / 291

主要参考书目 / 297

前言

本书尝试从历史角度探讨“东亚”与“现代”的关系。我们日常所说的“现代”，往往指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势力扩张而到来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和文化转型。特别是冷战以来，主流的“现代化”理论更成为一种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义论述。我把这种狭义的现代观称为“殖民现代”，它只是多元现代化道路中的一种。在殖民现代语境中，“东亚”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，而带有强烈的时间性和种族性。我试图梳理出一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为参照的“东亚现代”，并把这个现代的起点，定为16世纪。不以欧洲为参照的意思，是既不全盘接受，也不全盘否弃；反思欧洲中心主义，但也不塑造一个东亚（或中国）中心主义。也就是说，欧洲、亚洲、美洲乃至非洲的多元的现代历史，都可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，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，也不遵循同一种发展逻辑。同时，这些观念和逻辑又不是各自孤立的，人类的现代状况是它们相互影响、吸纳、对抗、对话的结果。

从2015年秋天起，受单雪菱的邀请，我开始在澎湃新闻发表“发现

东亚”专栏。前后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。现在这本书，是这个系列的修订集结。它的大框架，来自我在美国所教的东亚史概论（survey）课。

我自知学力不逮，想要概括出如此广阔的区域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中的发展演变，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但最终鼓起勇气一试，一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就在一直强调跨区域的视角；而更主要的是：在我的教学实践中，“东亚现代”一直是一个核心命题。既然教学的目的是提供知识和历史认知，那么把课堂中的讨论适度增删，变成适合汉语读者的简明读物，大概还不算太不务正业。

所以，我必须要向对本书抱专业期待的读者致歉：它不是一本研究性著作，并无对史料的深度挖掘或独创的发现。使用的材料，除了极少数来自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，大都提炼自现有的著述。书中涉及了很多不同领域。对这些领域的专家而言，我的介绍可能是常识性的。我的工作是尽量摘取较为前沿的研究，加以整理，用几个连贯的主题串联，加入我自己的视角和理解，然后转化成面对普通读者的文字。

我曾以为学者的任务仅在于研究，教学只是辅助。直到毕业开始工作，才体会到教学对职业学者而言同样重要。我 2013 年在美国瓦萨学院（Vassar College）教授东亚史，三年后开始任职于现在所在的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（UMBC）。美国的大学里，对学者（特别是人文社科学者）的升迁评价，都是科研与教学并重（此外还有对学校的服务）。即使是研究型大学（比如 UMBC），对教学的评估比重也不低于研究；而文理学院（Liberal Arts College，比如瓦萨学院）的教学甚至更重于科研。在这两个学校，我都被指定教授一门面向本科生的东亚史入门课。在 UMBC，东亚文明史属于“文化核心”课中的一门——所谓核心课，即所有本科生，不分专业，都要修习的通识

性课程。

也许在不少人看来，教学等于传授知识，无非是讲课、测试、评分。实际则远非如此。教学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智识训练，尤其是通识课。历史教学中，介绍知识固然重要，但面对美国本科生，特别是非历史专业，甚至非文科专业的本科生，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批判性地理解过去，如何把思考方法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。历史不是背完就忘的死的知识点，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当中。因此，历史教学不仅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信息，更是要提出一种观察和思考的角度，让过去与现实产生关联、生发意义。教学必须从受众，而非研究者的角度，去呈现思考。

职业化的历史研究，往往针对具体而微的题目；教学则逼使研究者从相对狭小的领域中走出来，为更宽广的时空脉络提供解释。而拓宽视野、进入陌生，又是对研究最好的刺激，能让我对自己熟悉的课题不断产生新的联想，发现新的意义。“教学相长”的含义，便在于此吧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上课也好，写作也罢，都不是由上而下地“普及”知识，也不是把复杂历史作娱乐化处理，而是挑战自己是否能用相对简明的材料揭示更大的问题，提出有效的思考路径。

所谓更大的问题，对于我来说，是讨论现代中国何以形成，修正近代以来对本地区历史的一些成见。我采取的视角，是把中国放在区域（东亚）甚至全球的框架中，探讨较长时段中的演变。这当然受到今天区域史、全球史思潮的影响，但另一方面也是教学的需求。美国的大学历史课堂，分量最重的自然是美国史，其次是欧洲史。东亚/中国史地位虽然日益上升，但仍属于边缘。除了少数几所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，一般学校提供的国别史课程，只能顾及几个最重要的大国。

非美国史的学者，往往要承担区域史，甚至世界史的教学，所要了解的范围不能囿于自己研究的国家。当今全球史的领军人物，大都出自正统美国史以外的领域，恐怕和这种教学机制不无关系。

说起来，相比其他区域（比如中亚、中东、非洲），东亚的国别史教学还算是美国课堂中最突出的。因为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不但有较长的延续性，而且都形成了今天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国家。但把中、日、韩的历史分开讲述，强化了晚近才形成的民族国家边界，容易过度强调三者之间的差别，而忽视它们内部的多样性，以及东亚社会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密切关联。跨国史、区域史、全球史之所以成为越来越多东亚研究者所采用的视角，也是因为它们挑战了僵化的国家边界，拒绝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个孤立单元的拼贴，而是通过关注人口、物质、制度、思想的跨社会流动，探索东亚社会的有机互动。

美国史学家杜赞奇（Prasenjit Duara）曾指出，中国的现代国家进程，只有放在东亚区域中，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一进程一起观察，才可以更好地理解。本书即大致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。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，今天的中、日、朝/韩，和历史上的中、日、韩并不一致。读者应避免用 20 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，去套用 16 到 19 世纪的状况。明清时代中原、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当然有各自的认同，但这种认同相互交叠错落，不是像今天的边境、护照那样界限清晰。最近不少著作都在谈“去中国中心”，突出半岛和列岛在明清之际产生的独立于中原的身份诉求。我想指出的是，它们当时“求异”的努力恐怕和“求同”的努力一样大。我们不应把这种身份与以国籍标志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。描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转化，正是本书的任务之一。

与此相关，我也恳请读者不把“中国”“日本”“朝鲜/韩国”

这些概念作本质主义解读。本质主义假定在“外部文明”到来之前，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“本土”（indigenous）传统。常有论者致力于向内寻求中国/东亚的“核心”“精髓”，以找出一套独立于西方的文教制度，比如汉字、儒家，以及（本地化的）佛教等等。可是文化一刻不停地在变化，总在内外互动中吐故纳新——就好像源于印度的佛教被逐渐内化成本地信仰一样。我们今天认为的“传统”，大多是到了晚近才重新发现或发明的（想想《弟子规》或者“汉服”），很多特征是参照“西方”而刻意塑造的（比如“西洋画写实，中国画写意”）。这种逻辑和殖民现代性逻辑一致，并不是历史实相。本质主义的“西方”和“本土”，就像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，看似对立，实则是一体之两面。

“东亚”“中国”“日本”“朝/韩”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。这些概念是在区域内部交往以及区域与外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。塑造它们的过程远没有结束，未来也一定会有旧的内容被舍弃，新的内容增添进来。唯一不变的，是对它们的不断定义、否定、再定义。也正因如此，关于东亚的历史书写，乃至任何历史书写，都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。在几年的教学和写作后，最初的一些认知已经需要进一步反思。所以这本小书呈现的不是定论，而是思考的可能。它欢迎讨论、批评、纠正和补充。

感谢单雪菱、杨晓燕两位编辑，没有她们的鼓励、支持（以及怂恿），就不会有这些文字。不少篇章曾得益于和朋友们的讨论，在此特别鸣谢王元崇、张杨、刘文楠、杨成、张昕、周宇、张平、苏福兵、丘培培、王立平、田耕和蔡伟杰。我夫人赵燕灵常常是第一位读者，对我的文字提出过诸多修改意见，时刻提醒我避免语言的生涩和学术化。发表

在澎湃的文章得到过许多读者的批评指正，使我有机会订正错谬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2017年11月于巴尔的摩

一
亚洲反题

East
Asia

1. 何为“东亚”？为何“东亚”？

1885年，日本明治十八年。在3月16日这天，东京出版的政论新闻《时事新报》上，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，题为《脱亚论》。文章提出，日本要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，要拒绝与中国（支那）、朝鲜这样愚昧落后的“恶邻”为伍。

这篇文章在今天广为人知，一般认为其作者是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。不过关于这点，学界还有争议。更重要的是，和我们的想象相反，它发表后影响甚微：直到1933年收录于《续福泽全集》，它再没被人提起过。日本学者重新发现《脱亚论》，并且把这篇2400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国家走向相互印证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。而它成为讨论焦点，被普遍认定为日本走向近代、走向殖民侵略的先声，更晚至20世纪60年代。尽管文章被长期遗忘，但因“脱亚”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某种心路历程，所以在沉睡近百年后幽灵般苏醒。它迅速成了一个符号，象征一个国家（日本）对其所置身的共同体（亚细亚，或者东亚）曾经的态度。而对《脱亚论》的重新“发现”和讨论，则表现了一种特定时空中的历史思考。